

## 微言與解密——阮籍〈詠懷詩〉引用《春秋》 傳的闡解效應

蔡妙真\*

### 摘 要

魏晉之際，朝政靡亂，士人在求生存的生命本能與高尚志節的精神之間，出處的矛盾逐漸浮現，洵至成了遵儒或崇道的擰扯。亂世浮生下，阮籍其人行事與〈詠懷〉諸作皆有「厥旨淵放，歸趣難求」的特質，卻反而引起讀者攻堅的興趣。阮籍在創作之際，未嘗輕忽經傳的權威性，甚至時露對儒家經世濟民、立德立言等價值之崇慕，因而後代讀者多認定阮籍〈詠懷〉諸作中徵引經傳的部分，隱藏有「微言大義」，故闡解之際，特別鑽研且比附時事，以見譏刺。

文學未必是對現實世界或內在情志的直接複寫，而是將書寫對象或主題解構之後再建構。讀者閱讀活動也不是直接承受作者情志，必得緣文析字、考其人論其世，然後也是在「解構之後再建構」文本的意義。故本文剖析阮籍在創作〈詠懷詩〉時徵引《春秋》經傳的修辭法，及其對讀者的闡釋會產生怎樣的效應。

本文由二種徵引策略來討論「讀者如何受到經傳典故的引導並以此為據詮釋〈詠懷〉」：其一是明引暗用經傳，尤其是援引成詞的部分，此種書寫策略會引導讀者由該詞蘊含的文化象徵進行詩旨的掌握。其二是借經傳事典發揮議論，作者將針對歷史現場的批判，曲折地透過經傳記事投射出來，這樣的修辭更讓讀者認定阮籍〈詠懷〉是《春秋》微言大義表述法的再現。〈詠懷〉所引三傳典故幾乎全出自《左傳》，以傳播的角度而言，三傳在魏晉之際的升降之跡，於此亦略可見其脈絡。

**關鍵詞：**《春秋》、三傳、詠懷詩、徵經、阮籍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The Hermeneutics Effect Caused by The Quotations of “Three Commentaries of Chun-Chio” in Ruan-Ji’s Yong-Huai Poetry

Tsai Miao-Chen\*

##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Three-kingdoms, the intelligentsia faced a strong dilemma in a desperate case--to act with infamy or quit the place. Ruan-Ji, as a celebrity, suffered from it a great deal especially in his late years. Therefore, his poetry are such an esoteric subject that most people are content to leave it to a mystery.

I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some ‘key point’ quotations of “Three Commentaries of Chun-Chio” in Ruan-Ji’s Yong-Huai. Therefore, readers firmly believed that Ruan-Ji must compose his literature in the Spring & Autumn Annals Style Writing. And it means he still affected by the Confucian classics. For this reason, when analyzing the spread of Confucian classics of the ages of the Three-kingdoms, we cannot ignore intelligentsia like Ruan-Ji, even who was not a specialist in Confucianism. He quoted Confucianism in his compositions. It surely was another kind of 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fact, we can try to figure out the hermeneutics of ChunQiu by inspecting the quotations of “Three Commentaries of Chun-Chio” in Yong-Huai.

This project surveyed Yong-Huai poetry to investigate what materials or issues of ChunQiu and the Three Hermeneutics of ChunQiu were quoted; how he quoted them, and the hermeneutics effects both to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hunQiu and to the style of Ruan-Ji’ s poerty. This project can fulfill the gaps of previous studies which only focused on the specialists in Confucianism. The outcomes can provide explanations

---

\* Associate Professor, Chines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hat are more delicate on the reason that the Confucianism was intermingled with metaphysics.

**Key word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hunQiu), the Three Hermeneutics of ChunQiu (ChunQiu SanZhuan), literary quotation, Ruan-Ji, Yong-Huai

## 微言與解密——阮籍〈詠懷詩〉引用《春秋》 傳的闡解效應

蔡妙真

### 一、阮籍及其〈詠懷詩〉

關於阮籍(210-263)性格，同時代的人多以「慎」評價其行事特質，最有名也最有力的評價當然是嵇康(223-263)〈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所說的「口不論人過」：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sup>1</sup>

對阮籍回護有加的司馬文王（司馬昭，211-265），也以「慎」譽其人：

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sup>2</sup>

這種謹慎小心的性格，延續到阮籍的史書撰作，也被批評「多為時諱」，略失秉筆直書的史家精神。<sup>3</sup>總之，阮籍之於慎默，在當代已然形成等號聯繫，其後屢被拿

<sup>1</sup> 三國·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唐·房玄齡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卷49·列傳·嵇康》（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8版），頁1371。

<sup>2</sup> 晉·陳壽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三國志·卷18·魏書·李通》（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8版），注引王隱《晉書》，頁536。又《世說新語·德行》亦曾簡錄此語：「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世說新語校箋》，頁13）。

<sup>3</sup> 《新校本晉書·卷39·列傳·王沈》：「（王沈）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頁1143。

來作為評比的典範，比如唐李延壽(?-?)總評北魏才子邢子才(496-?)一生，就認為「(邢子才)唯嘗短崔暹，頗為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sup>4</sup>清何焯(1661-1722)甚至引「嗣宗至慎，卒得保持」為座右銘，<sup>5</sup>其人之慎默形象，由此可見一斑。但後代史傳總結阮籍一生行事時，雖亦稱其人「喜怒不形於色」、「口不臧否人物」，<sup>6</sup>同時卻也點出阮籍慎默的表現雖有道家思維的影響，其實大部分原因來自壓抑，其意識中的儒士懷濟天下之思，在現實壓力下化為孤鯁清慎的行事風格：

(阮籍)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sup>7</sup>

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縱酒昏酣，遺落世事。<sup>8</sup>

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sup>9</sup>

阮籍憂時卻得藏志的不得已，讓他言行時或有「藏不住」之舉，《世說新語》載王忱(?-392)評論阮籍喝酒，就有「耽酒正見其人之壓抑」的意思；<sup>10</sup>李延壽也認為阮籍的與物無傷，只是「民之多僻，無自立僻」的亂世保身之道耳；<sup>11</sup>宋代李杞

<sup>4</sup> 唐·李延壽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北史·卷43·列傳·論曰》(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8版)，頁1614。

<sup>5</sup>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文選·卷2·詩》((日)京都：中文出版社影清刻本，1982年)，頁15。

<sup>6</sup> 《新校本晉書·卷49·列傳·阮籍》，頁1359，1361。

<sup>7</sup> 《新校本晉書·卷49·列傳·阮籍》，頁1359。

<sup>8</sup> 《新校本三國志·卷21·魏書·阮瑀》注引《魏晉春秋》，頁604。

<sup>9</sup> 宋·佚名：《歷代名賢確論·卷61·賞譽》引韓愈語，頁404。收入清·紀昀等奉敕編纂：《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影印)。

<sup>10</sup> 《世說新語校箋·任誕》：「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頁575。

<sup>11</sup> 《新校本南史·卷47·列傳·論曰》：「玩之臧否之尤，著在懸車之日，是知嗣宗所誠，蓋亦遠有致乎……『人之多僻』，蓋詩人所深懼也。」，頁1184。

(1168-1220)也以阮籍逃於酒來說解〈未濟〉上九爻辭「有孚於飲酒，無咎」：

當未濟之極，雖有忠信之誠而勢不可以有為，故自放于酒以全身遠害而已。晉阮籍之流，豈真無意于世哉？唯知其不可奈何，不得已而以酒自迷，以求全於亂世也。<sup>12</sup>

何以以至慎緘默著稱的阮籍，會被後人認為胸中鬱積有壘塊？而非純然遺落世事的隱者或慕道者？此蓋壘塊亦有酒所澆之不能的時候，以是史傳不煩記其蛛絲馬跡，以憐其人一生之壓抑與精神困厄：<sup>13</sup>

(阮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sup>14</sup>

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sup>15</sup>

後人多指認「途窮慟哭」有「假事諷時」之意；<sup>16</sup>無論事實如何，「途窮慟哭」之舉猶堪稱模糊形色，未有具指；但稱楚漢英雄為「豎子」，又以指涉兩可的「時」為稱，（彼時或此時呢？）可絕不是什麼「口不臧否人物」的行為；<sup>17</sup>以青白眼褒

<sup>12</sup> 宋·李杞：《用易詳解·卷 12·未濟》，頁 146。收入（清）紀昀等奉敕編纂：《文淵閣四庫全書》。

<sup>13</sup> 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年，初版）稱阮籍一生：「始終徘徊于高潔與世俗之間，依違於政局內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悶中尋求解脫。」（頁 105）。李紅巖：〈魏晉南北朝困厄文人創作研究〉（陝西師範大學中古代文學 2011 博士論文）據此將阮籍歸類為「精神困厄型文人」（頁 22）。

<sup>14</sup> 《新校本三國志·卷 21·魏書·阮瑀》注引《魏晉春秋》，頁 604。

<sup>15</sup> 《新校本晉書·卷 49·列傳·阮籍》，頁 1361。

<sup>16</sup> 《歷代名賢確論·卷 88·憲宗三·韓愈》引沈顏語曰：「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頁 580。明·方孝孺《遜志齋集·卷 21·大笑生傳》也提到：「說者曰，昔者楊朱阮籍皆好哭，彼非好哭也，心有所憤，無以自舒，因以寓其意。」（臺北：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印，1970 年，臺 2 版，頁 23）。

<sup>17</sup> 「豎子」何所指？由蘇軾一段記事即可看出阮籍指桑罵槐又能脫身的抒懷目的其實是達成了：「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

貶人物，更是直接而露骨，甚至引起禮法之士疾之若讐，<sup>18</sup>則阮籍處世的矛盾（或曰其情志與現實之不能相諧），其實是昭然若揭的。

以阮籍壓抑性格與行事風格推論其創作，後人因而認定他發為歌詠亦必如是——「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sup>19</sup>在疏淡玄遠的表層文字底下，想必有洶湧的思緒、滂渤欲出的譏刺與憂思。劉勰(465-?)說他「使氣」，<sup>20</sup>宋嚴羽(??)說他〈詠懷〉之作「有建安風骨」，<sup>21</sup>顯現其創作看似「初不苦思，率爾便成」，<sup>22</sup>其實仍是個人志氣才情發抒的重要管道，顏延之(384-456)因此說他看似沈醉淪跡，其實對世事有其洞鑒，言辭之間有其譏諷與寓意：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sup>23</sup>

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今日讀李太白〈登古戰場〉詩云：『沈酒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東坡志林·卷1》（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初版，頁7）。又明焦竑也指稱李白的解讀是錯的：「阮籍登廣武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也。太白詩『沈醉呼豎子，往言非至公』則謂豎子為沛公。」（《焦氏筆乘·卷3·唐人用事之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初版），頁108）。

<sup>18</sup>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即曾就此批評阮籍之得全，實因附司馬氏耳，非其人之慎默：「嘗稱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為可師。殊不知。籍雖不臧否人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嵇康）？籍得全於晉，直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耳。史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收入宋·左圭輯：《百川學海·壬集》（（日）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影本），頁6）。

<sup>19</sup> 南朝梁·蕭統編撰，唐·李善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卷23·詠懷·阮籍詠懷詩十七首之一》（臺北：華正書局影宋本，1980年，初版），頁417）李善注，。

<sup>20</sup> 南朝梁·劉勰著，陳拱本義：《文心雕龍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初版）：「嵇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頁1161。

<sup>21</sup> 宋·嚴羽著，清·胡鑑注，任世熙校：《滄浪詩話校注·卷4·詩評》（臺北廣文書局影清刻本，1972年）：「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頁158。

<sup>22</sup> 晉·臧榮緒：《晉書·卷9·阮籍》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沈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頁74。收入《新校本晉書》附編二：「九家舊晉書輯本」。

<sup>23</sup>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21·詩乙·詠史·顏延年五君詠五首·阮步兵》，頁393。根據《南史·顏延之傳》記載，此詩詠乃顏延之藉以刺譏時人者：「（顏延之疏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詠阮

阮籍「寓辭類託諷」的書寫模式，及所諷之旨，在〈彌猴賦〉、〈大人先生傳〉等篇章是極為清楚的，但語言模糊度更高的詩篇呢？《詩品》評阮籍「《詠懷》之作……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sup>24</sup>後人闡釋阮籍詩篇，多引《文心》「阮旨遙深」<sup>25</sup>為核心論述，從而向著「遙」遠的他方開展，比附具體時事，挖掘具體體譏刺對象的「深」意。尤其說〈詠懷〉諸篇是「觸緒抒騷，煩憂命管，畏顯題之賈禍，遂詠懷以統篇……此皆詠悲憤之懷也。」<sup>26</sup>所以魯迅(1881-1936)甚至覺得阮籍的詩文意思雖「隱而不顯」，但確實都「慷慨激昂」的。<sup>27</sup>

阮籍除了五言體的〈詠懷〉，依據逄欽立(1910-1973)輯校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尚收錄有〈四言詠懷詩十三首〉，<sup>28</sup>真偽尚有疑議，肯定其為阮籍之作者，則認為四言體〈詠懷〉屬早期作品，「這類詩歌多直抒胸臆，比興意顯，語言華美亦不失自然，風格明朗，與建安詩風近似。幾無後期『厥旨淵放』之風。」<sup>29</sup>阮籍於這些詩中，表明希慕的是「堯、舜、齊桓用賢治世」、「姜太公、張良佐王靖亂」的功勳；<sup>30</sup>甚至以三不朽為人生目標，<sup>31</sup>皆屬明言儒士的抱負與夙昔典範。但此組詩作語意較為顯豁，且後人闡評言及者少，因本文側重「徵經的閱讀效應」，故四言體〈詠懷〉不列入本文討論範圍。

至於阮籍五言〈詠懷詩〉的創作時間，相關研究多認為這八十二首作品非「組詩」，<sup>32</sup>且創作時間為中晚期，<sup>33</sup>亦即「魏、晉易代」之際。<sup>34</sup>曹魏後期司馬氏爭權

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新校本南史·卷34·列傳·顏延之》，頁878。)

《文選》張銑註則進一步引申：「延年自託以為途窮者。」

<sup>24</sup> 南朝梁·鍾嶸著，陳延傑注：《詩品注》(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初版)，頁23。

<sup>25</sup> 《文心雕龍本義》，頁1161。

<sup>26</sup> 清·陳沆：《詩比興箋》(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初版)，頁40。

<sup>27</sup>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收錄於《魯迅作品全集·而已集》(臺北：風雲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初版)，頁124。又唐翼明：《魏晉文學與玄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初版)也提到：「以嵇阮為代表的『正始之音』，多少還繼承了一些建安文學的解放精神和慷慨風骨。」(頁41)。

<sup>28</sup> 逄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十·阮籍》(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初版)，頁493-496。

<sup>29</sup> 劉運好：《魏晉哲學與詩學》(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81。又如呂光華：〈論阮籍四言詠懷詩的內容與特質〉(《國文學誌》第9期(2004年12月)，頁75-92)，亦肯定阮籍四言詩的成就不在嵇康之下。

<sup>30</sup> 如《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10·阮籍·四言詠懷詩十三首之三》，頁494。

<sup>31</sup> 如《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10·阮籍·四言詠懷詩十三首之八》，頁495。

<sup>32</sup> 日人吉川幸次郎與他人意見略有不同：「阮籍〈詠懷詩〉……是篇數眾多的組詩。正像許多注家指出的那樣，它們不是一時之作……不過，它們大體上表達有相同的思想基



亂政，士人見逼，必得對權勢表態、依附乃得以求生；而權勢嘴臉又實在令志節之士難以棄毀自尊而罄折，裝瘋賣傻竟成了苟全於亂世的法門，內心翻攪的感慨與抱負只好迂曲地以談玄論隱、徵經詠史來「遙深」其旨了。〈詠懷〉「以『比興』的語言方式寄託了詩人對政教關懷的情志」；<sup>35</sup>「比興不僅是創造藝術意象的必要手段，在政治黑暗的年代，它還是保護作家人身安全的重要方法。正始詩人阮籍就是突出的例子……阮籍的八十二首〈詠懷詩〉寫得特別隱晦，詩人多用比興的手法，來書寫心中種種悲愁苦悶的情緒。」<sup>36</sup>文學與現實世界或內在情志的距離，正在於隱喻、比興等轉化手法，姑不論阮籍〈詠懷〉諸詩，在下筆之際是否有其確實可指的譏議對象，但由阮籍的徵經用典、比興等手法，能肯定的是創作者必有設定的讀者對象，透過此類修辭，必然引起同樣有經學背景的讀者的閱讀效應，此不能說是阮籍無意的安排。

調，充分具備著組詩的性質。」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初版），頁208。

<sup>33</sup> 持其說者如劉運好：《魏晉哲學與詩學》：「相較於五言的〈詠懷八十二首〉，阮籍的四言體〈詠懷〉屬早期作品，「這類詩歌多直抒胸臆，比興意顯，語言華美亦不失自然，風格明朗，與建安詩風近似。幾無後期『厥旨淵放』之風。」」（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81）；高晨陽：《阮籍評傳》：「（〈詠懷詩〉八十二首）所反映的基本上是阮籍後期的思想狀況和心理狀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初版頁181。）；徐啟秀：〈阮籍〈詠懷詩〉研究〉：「阮籍詠懷詩并非組詩；阮籍詠懷詩并非集中創作于某一時期，但創作的高峰期在阮籍人生的最後十多年，對當時的政局和時人皆有評議。」（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2010碩士論文，中文摘要，頁1）「絕大部分詩歌作于司馬氏當權之時，阮籍人生的最後十多年是他〈詠懷詩〉創作的高峰期。」（同前文，頁39）。錢志熙〈論阮籍〈詠懷詩〉〉：「阮籍的〈詠懷八十二首〉，極有可能是在任東平太守前後開始創作的。也就是說，是在四十五六歲的時候開始寫作的……應在正元二年到景元四年之間。」（《東方叢刊》，2008年第1期（2008年），頁112。）

<sup>34</sup> 《義門讀書記·文選·卷2·詩》：「〈詠懷〉之作，其歸在於魏、晉易代之事，而其詞旨亦復難以直尋。」，頁12。

<sup>35</sup> 呂正惠，蔡英俊：《中國文學批評·卷1》，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初版，頁210。

<sup>36</sup> 李家樹，陳桐生：《經學與中國古代文學》，香港大學出版社，2004年，初版，頁37-38。又云：「阮籍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中，運用比興而又有所創新，這樣他既可以宣洩胸中鬱積的各種苦悶，又能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保全自己，這就是作為詩人的阮籍，他的獨特的生存方式。（頁40）。

## 二、〈詠懷詩〉所見《春秋》傳及後人之闡解

前賢謂阮籍詩作有意識迴避現實，<sup>37</sup>若如前節所述，阮籍未必是「迴避」現實，而是不以直尋的方式反映現實，「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俛免。」<sup>38</sup>居亂世微其言以避禍，亦是人之常情。阮籍〈詠懷詩〉喜以大自然起興比附，復又典故交紛，因而意象旨趣繁興，但讀者日攻月較，絲析髮解，總是能於其中安頓詮解，故後代效之、闡之者不絕，其因也正在於「淵放」的書寫模式，讓讀者在文本中有迴翔思繹的空間。論者謂「嗣宗〈詠懷〉比喻太切，故不免有跡。後人雜詩感遇等作……多法嗣宗者，正以有跡而可求故耳。」<sup>39</sup>這裡所說的「跡」，正是詩中的比興與典故。<sup>40</sup>也就是說，阮籍是否有意透過〈詠懷〉影射時事，乃至譏諷特定人物，或許已是難以考索的論題，但闡解所能作的，就是透過留存在詩句文字中的「跡」，揣想其所詠之情懷脈絡、蠡測其歸趣。

阮籍在〈詠懷〉留下的「跡」中，以徵引經書文句最引人注目，蓋後人總以「正始玄風」作為「儒衰」與「道興」的轉捩點，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甚至將亡國教淪之責，直接歸在名士<sup>41</sup>棄經典而尚老莊的作為底下：

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之倡也。自此以後，竟相祖述……以至國亡於上，

<sup>37</sup> 曹勝高：《從漢風到唐音：中古文學演進論稿》：「黃初之後複雜而又敏感的政治風氣，使詩人們有意識在詩作中迴避現實事件……正始年間，阮籍有意識迴避現實，既不用詩敘事，也不用詩歌言志……融合著玄思表達和景物描寫，形成一種更具抒情意識的詩學實踐，為西晉『緣情』的詩風形成作了鋪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初版），頁43-44。

<sup>38</sup> 東周·管仲著，王冬珍，徐文助，陳郁夫，陳麗桂校注：《管子·宙合》（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年，初版），頁271。

<sup>39</sup> 明·許學夷：《詩源辯體》卷4，（明崇禎15年陳所學刻本），頁46。

<sup>40</sup> 許學夷對「有跡」的進一步解釋是：「嗣宗五言〈詠懷〉八十二首，中多興比，體雖近古，然多以意見為詩，故不免有跡。其他托旨太深，觀者不能盡通其意，鍾嶸謂其『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是也。」（同前注，頁46）。（案：「托旨」宜作「託旨」，本處僅依引文原用字）

<sup>41</sup> 狹義的「正始名士」指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與竹林七賢區別，見《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校箋》，頁210）；廣義者則涵蓋前後兩期人物而言。如裴頠並稱何、阮二人：「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任不事事……。」（《新校本晉書·卷35·列傳·裴頠》，頁1044）。

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遍於天下。<sup>42</sup>

以學術發展的角度來談文學風尚，則正始文風最是背負儒學式微、道學滲入，從而帶動文學玄言詩風潮的責任。<sup>43</sup>阮籍雖崇放達，時露箕山之志，但於創作中又不乏徵引經典，甚至亦有明舉儒經以為己志者，<sup>44</sup>與顧炎武或裴頠(267-300)指斥之「棄經典」、「不尊儒術」之形象並不完全相合，其作品之徵經與一般認定的正始「玄音」也有些許落差，故很容易在讀者閱讀時引起注目，甚至認定其中必有深意。可見其創作中的徵經，引起的闡解效應比一般的比興修辭還大。

今考阮籍五言〈詠懷〉，其中徵引《春秋》經傳文句或事典者其實不算多，而且幾乎全出《左傳》；<sup>45</sup>但八十二首中，引用《左傳》典故的幾首常是後代讀者討論的焦點，以下粗分為徵引字詞與借題發揮兩類為說。

### (一) 徵引字詞以達隱喻

援徵經典，引據古義，除了可為創作或議論樹立權威，最大的修辭效果在於「擴充文字意義」這個層面；「比興」本身即可能含帶隱喻，而徵引經典字詞，除了字面本身因比興而來的類比意義，更多時候是作者有目的的希冀原典為新文本帶來繞樑不絕的言外之意，藉以突破新文本字面的侷限，增加詩的多義性。甚至可以說作者因「現實界的曖昧性反映在文辭的多義性中」，而「據此在文章裡使用語帶雙關的模稜義，甚至以雙關語論證。」<sup>46</sup>方東樹(1772-1851)即曾以雙關語的說法闡解阮籍〈詠懷〉。<sup>47</sup>阮籍意識中必已認定《左傳》經傳某些字詞事典，已積

<sup>42</sup> 清·顧炎武著，徐文珊點校：《日知錄·卷17·兩漢風俗》(臺北：臺灣明倫書局，1979年，初版)，頁378-379。

<sup>43</sup> 王師夢鷗總結「正始文風之影響」云：「(何晏的著述)雖與詩賦之類作品無關，但他把老莊的思想引入儒家的體系，造成正始以下的玄風，在文學發展上卻有很大影響。」(《傳統文學論衡》(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初版)，頁138)。

<sup>44</sup> 比如其四言〈詠懷〉就明舉「三不朽」以為人生目標：「日月隆光，克鑒天聰。三后臨朝，二八登庸。升我俊髦，黜彼頑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仁風廣被，玄化潛通……。」(《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10·阮籍·四言詠懷詩十三首之八》，頁495)

<sup>45</sup> 〈詠懷〉所用諸典，唯「頌聲」一詞出自《公羊》宣公十五年，詳注88。

<sup>46</sup> 吳光明：〈古代儒家思維方試論——中國文化詮釋學的觀點〉，頁73。收入楊儒賓，黃俊傑編：《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初版)，頁35-84。

<sup>47</sup> 阮五言〈詠懷〉詩第五首有「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句，清·方東樹：《昭昧詹

澱豐富的文化意涵可供創作者提取、依附，故而徵用之以為修辭策略。如此一來，對讀者來說，「隱喻的正確理解不能訴諸單純的辭彙層面，而是要研究概念結構層次。」<sup>48</sup>一個詞彙意義的文化積澱，以及該詞之所以成為「典」的語境，就是概念結構層次。

比如《左傳》成公九年，莒敗於楚，君子評議乃因莒不設備，且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蕉萃。」<sup>49</sup>但後人引此二句多歸出處為《左傳》，如《後漢書》云：「《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sup>50</sup>杜預注云：「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左傳》引「蕉萃」已有意利用來自詩歌的比喻特質，而阮籍用「憔悴」一詞，卻又更可能夾帶了《左傳》裡「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的感喟。<sup>51</sup>其詩云：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蕈，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魏詩卷十·阮籍《詠懷詩 82 首》3，頁 497)<sup>52</sup>

這世界沒有永恆的春天，也沒有不凋的繁華，世況已是如此，若猶有恃無備，則瞬息秋風，就足以零落成憔悴。後人闡解此詩，有「『嘉樹零落，繁華憔悴』比喻

言·卷 3》（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公司，2004 年，初版）：「阮，陳留人，魏都鄴，此言望三河反歸，借指家國，雙關譎言之耳。」，頁 84。

<sup>48</sup> 張燕燕，鄭亞南：〈概念隱喻理論與類包涵理論的比較研究〉，《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2 卷第 4 期（2010 年 12 月），頁 82-92），頁 82。

<sup>49</sup> 「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sup>50</sup> 南朝宋·范曄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卷 48·列傳·應劭》（臺北：鼎文書局，1995 年，8 版），頁 1606。

<sup>51</sup> 當然「憔悴」出處也可能來自《莊子·漁父》：「顏色憔悴」，以此表明「自持高潔」之志；或阮籍單以普通詞彙用之，初無典故之思，歷代闡釋此詞者各有所取。由於本文探究讀者闡解詩旨時被《左傳》原典影響的闡解效應，故取諸家中傾向《左傳》原典的闡釋來討論。

<sup>52</sup>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初版）。以下所引阮籍詩皆為此版本，為節省篇幅，其獨段徵引者，直接於詩末標明卷數及頁數，除非有其他說明，否則不另行加註。

曹魏的宗室受到司馬懿剷除戕害」的說法。<sup>53</sup>何焯甚至認為「此詩指趣灼然，略無隱避。而當時得全者，以其不過志於自全避禍，非若叔夜之非薄湯武指斥賊臣故也。」<sup>54</sup>何以「嘉樹零落，繁華憔悴」會指向司馬氏呢？此閱讀效應正是與「嘉樹」、「憔悴」等出自《左傳》的成詞有關。

「嘉樹」出《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聘魯，昭公享之，宴會上季武子賦〈絲〉之卒章，宣子賦〈角弓〉。後宴于季氏，宣子譽其嘉樹，武子表示將封殖此樹，以無忘宣子賦〈角弓〉之情，並從而賦〈甘棠〉。<sup>55</sup>李善注《文選》以為阮籍「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兩句乃化用班固《漢書·李廣》贊引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來，<sup>56</sup>然此注僅只見其句型之變用耳，阮籍此處稱嘉樹，當非取《漢書》「此言雖小，可以喻大」<sup>57</sup>之意；杜甫〈冬日有懷李白〉：「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sup>58</sup>的用法與阮意庶或近之。亦即「嘉樹」一詞，因《左傳》原典而有兄弟相親（〈角弓〉）、召公輔政（〈甘棠〉）等聯結義。曹氏二代託孤司馬懿事，史傳斑斑可考，<sup>59</sup>在阮詩中「嘉樹」配合「繁華」與「憔悴」的前後落差，加上「憔悴」在原典裡的「陋賤之人」之義與「不設備」之評，

<sup>53</sup> 《葉嘉瑩說阮籍詠懷詩》，頁 53。陳沆即指出：「『嘉樹零落，繁華憔悴』，皆宗枝翦除之喻也。」（頁 44）。清·陳祚明選輯，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魏 4·卷 8》亦云：「此悲魏社將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初版）頁 239。

<sup>54</sup> 《義門讀書記·文選·卷 2·詩》，又云：「秋風吹飛蓬，傷六族之被夷也。」頁 12。

<sup>55</sup> 季武子賦〈絲〉之卒章，杜注云：「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宣子賦〈角弓〉則是「言兄弟之國宜相親」；武子賦〈甘棠〉則取「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

<sup>56</sup>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 23·詠懷·阮籍詠懷詩十七首之一》李善注，頁 1068。

<sup>57</sup> 東漢·班固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卷 54·列傳·李廣》，頁 2469。

<sup>58</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卷 9·近體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初版，頁 304。

<sup>59</sup> 《新校本三國志·卷 13·魏書·明帝叢》：「（景初）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頁 114）。注引《魏略》曰：「（明）帝……召司馬宣王……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又引《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頁 114）。《新校本晉書·卷 1·帝紀·高祖宣帝懿》也記其事，先述魏文帝託孤事：「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頁 4）。後述魏明帝託孤事：「天子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頁 13）。

後人因謂阮籍此詩或寓曹氏以兄弟相親對待司馬氏，並對之有「無忘〈角弓〉」的期許。無奈司馬的惡意一如凝霜秋風，<sup>60</sup>不設備的曹魏終致由繁華而憔悴。方東樹闡釋〈詠懷〉其他篇章時，亦曾言曹魏對危機之不悟，故「權一失即滅亡也」。<sup>61</sup>於此詩則曰：「此以桃李比曹爽，言榮華不久將為司馬氏所滅。」<sup>62</sup>因此，透過「嘉樹」、「憔悴」等詞的文化語境，<sup>63</sup>與阮籍時事的情景語境，讀者判定「當曹芳被廢時，阮籍在司馬師大將軍府，感觸甚多，乃作〈首陽山賦〉及〈詠懷〉——〈步出上東門〉、〈嘉樹下成蹊〉等詩，用象徵的手法隱喻時事。」<sup>64</sup>

另一首也被強烈認定與司馬氏廢魏室有關的作品是第十六首，闡解所據也是由詩中所徵引的《左傳》字詞開展的：

徘徊蓬池上，還願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10·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之十六》，頁500)

<sup>60</sup> 吉川幸次郎認為阮籍〈詠懷〉的主要內容充滿了憂生之嗟，而生命的不幸除了自然歲月的流逝難挽，主要的原因卻是在於人性的惡意：「詩人十分重視並深刻指出了致使人們喪失幸福、產生不幸的直接原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心懷惡意、相互怨仇。」(《中國詩史》，頁223。)  
「阮籍之所以特別認為致使人生艱難的原因是世人相互仇視、相互逼道，毫無疑問是由當時的政治形勢所決定的。在當時的司馬氏篡奪曹魏王權的過程中，先是曹爽、何晏等在他四十歲時被殺，繼之魏帝曹芳在他四十五歲時被廢為齊王，接著被立為魏帝的高貴鄉公曹髦在他五十一歲時被殺。隨後友人嵇康在他五十三歲時慘受極刑。」(《中國詩史》，頁228)。

<sup>61</sup> 「……筆勢同『視彼桃李花』。『嗟嗟』二句，申言禍釁之必然而不可保，痛極長言悲號。此蓋專指曹馬之交，危機如此而爽不悟，權一失即滅亡也。」《昭昧詹言·卷3》，頁88-89。按：「視彼桃李花」指第十八首「視彼桃李花，誰能久熒熒」，「嗟嗟」指第二十首「嗟嗟塗上士，何用自保持？」

<sup>62</sup> 《昭昧詹言·卷3》，頁84。

<sup>63</sup> 岑紹基撮述韓禮德(Halliday, M.A.K. and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1976)對語境的分類，「文化語境(context of culture)」指「語言產生時的周圍環境(situation)以及部族的歷史文化背景(culture)。」(岑紹基：《語言功能與中文教學：系統功能語言學在中文教學上的應用》，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3年，初版，頁11)；「情景語境」(context of situation)指「構成語篇的直接環境，包括事件性質、參與者的關係、參與地點、形式等。」(頁8)。

<sup>64</sup> 莊萬壽：《嵇康研究及年譜》，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初版，頁142。與一般闡解認為此詩「言曹魏由繁華而憔悴」不同意見的有韓傳達：《阮籍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初版)，該書認為此詩乃：「企仙求隱」之作，桃李嘉樹等是比喻嵇康。(頁62)。

「鶉火中」、「羈旅」、「憔悴」等詞皆源自《左傳》。「羈旅」意義比較單純，出自莊公二十二年，管仲謙辭卿位，自稱「羈旅之臣」。本詩的「憔悴」看似單純形容君子之枯槁困頓，實另有深意，此當由「鶉火中」說起。歷來注家對「鶉火中」的解釋大約有二，其一表示秋涼時節，用以點出全詩的節氣背景；其二則比附歷史事件，認為阮籍以此暗埋興懷之線索，如何焯即確切的說：「此詩正指司馬師廢齊王事也。」<sup>65</sup>二說中，以「鶉火中」標記秋涼時節之說，恐失之過淺，蓋「朔風」、「陰氣」兩句即能充分點出季節並鋪排斯人獨徘徊的氣氛，實無必要再以「鶉火中，日月正相望」等曲折的表述法再次提點秋天。且由詩中「走獸飛鳥」馳騖擾動的狀態，以及「君子」、「小人」之較比，很難不讓讀者認定這兩句話必另有所指涉。

「鶉火中」語出《左傳》僖公五年，晉獻公問伐虢能否成功，卜偃以童謠分析滅虢的時間點：「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魏有兩次改曆法，<sup>66</sup>而史載司馬師廢帝為齊王在「九月甲戌」，立高貴鄉公在「十月庚寅」，學者據此解釋阮籍引用「鶉火中」，正是藉春秋時卜偃以夏曆推算的九月十月之交，暗指目下司馬廢立之事。

卜偃解釋童謠裏的「鶉之賁賁，天策焯焯」必指「丙子旦」，因為彼時「日在尾，月在策」，鶉火因居中天而賁賁然氣勢正盛，天策星則相對顯得黯淡無光。杜預注云：「天策，傳說星……焯焯，無光耀也。」可見，阮籍徵引「鶉火中」一詞，並非單純只用來指稱秋天，或定位時間，而是露頭藏尾，真正要說的是「天策焯焯」。「天策」象徵傳說等輔政君子。若將「天策」之意與「日月正相望」聯結，意思就更顯豁了。《左傳》襄公十四年：「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日月」因而有國君的象徵。然而在丙子當天早晨，「太陽位於尾宿，月亮在天策

<sup>65</sup> 「嘉平六年二月，司馬師殺李豐，夏侯泰初等。三月，廢皇后張氏。九月甲戌，遂廢帝為齊王。乃十九日，是月丙辰朔。十月庚寅，立高貴鄉公。乃初六日，是月乙酉朔。師既定謀而後白于太后，則正日月相望之時。末句言詩以言志，後之誦者考是歲月，論我之世，則所以詠懷者見矣。」（《義門讀書記·文選·卷2·詩》，頁12。）陳沆亦以此認定「此詩正指司馬師廢齊王事也。」（《詩比興箋·卷2》，頁43）；黃節亦云：「初，齊王芳正始元年改用夏正，則此詩正指司馬師廢齊王事也。」（黃節：《曹子建詩注三種／阮步兵詠懷詩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初版），頁342）。

<sup>66</sup> 詳見《新校本三國志·卷3·魏書·明帝》（頁108）；《新校本三國志·卷4·魏書·齊王芳》（頁119）。

星座……鶉火星氣勢旺盛，天策星則正在淹沒無光之時。」<sup>67</sup>這些成詞組合起來，的確充滿了「王道舛錯、君子道消」的象徵，難怪作者會「俛仰懷哀傷」。但若單以「形容瘦損、心懷憂戚」來闡解「憔悴」，則難以解釋何以作者既有守常道的高曠之志，<sup>68</sup>卻又「心懷憂戚」而至「形容瘦損」？依此，則「憔悴」應當同時含有原典「蕉萃，陋賤之人」的傷感與自我安慰，因君子守常道，不屑如小人般計功爭名，故甘於終為陋賤之人，無所憾惜與畏懼。以此詩為例，作者引用成詞，且利用其他同出《左傳》的成詞閃耀互燦，輻射出的文意就不會止於字面。

阮籍以太陽（白日、朝陽、當陽）喻君王，其實有跡可尋，並非單出前例，其尤為顯豁者如〈詠懷〉第十九首：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織羅衣，左右佩雙璜。修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寄顏雲霄閑，揮袖凌虛翔。飄颻恍惚中，流眄顧我傍。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10·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之十九》，頁500）

此詩前賢多指出其中有「君臣之思」的寓意，如蔣師燾(1743-1793)曰：「當陽是何等事，佳人則臣道也。」明劉履(?-?)曰：「此嗣宗見賢聖之君而不可得，中心切至……。」朱嘉徵(1602-1684)云：「西方有佳人，傷明王不作。」<sup>69</sup>諸家對此詩意義的掌握，大多全來自於「白日」、「朝陽」兩成詞的文化象徵。阮籍〈詠懷〉第三十二首也同時用了這兩個詞彙：「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方東樹以當時的王室釋之：「以朝陽興魏，言去此若俯仰，猶言其亡也忽焉。」<sup>70</sup>針對兩詞的實指，王闓運則稱：「言不為魏死，恥與晉生。」<sup>71</sup>意見雖與方不同，但就「白日」有「王者」象徵之說，意見其實與方是一致的。

「白日」有國君象徵已如前述；至於「朝陽」比附國君，而成有特定象徵意義

<sup>67</sup> 陳久金：《中國星座神話（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二十））》（臺北：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初版），頁115。

<sup>68</sup>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文化史》亦云：「『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這是寫志。」（臺北：知書房出版集團，1995年，初版），頁165。

<sup>69</sup> 以上引文皆見《曹子建詩注三種／阮步兵詠懷詩注》，頁346。

<sup>70</sup> 《昭昧詹言·卷3》，頁90。

<sup>71</sup> 《曹子建詩注三種／阮步兵詠懷詩注》，頁367。



的詞彙，出自文公四年魯文公在宴饗衛甯武子時，賦了〈湛露〉及〈彤弓〉兩詩，衛甯武子認為此詩為天子宴饗諸侯之樂，不敢僭越而有所應答：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阮籍「舉袂當朝陽」一句，正是化用「天子當陽」而來，《左傳》文公四年：「天子當陽，諸侯用命。」「當陽」一詞，用以喻天子所居。也因原典有「諸侯用命」一詞，故黃節(1873-1935)認為由「舉袂」來看，此詩乃記阮籍不應曹爽之召。<sup>72</sup>由前人對此詩旨意掌握的法門及闡解，最可看出引用經傳成詞的閱讀效應。

上述諸家對阮詩的闡解有否比附太過呢？阮籍的確偏好以日月喻君王或政朝，如「日月隆光，克鑒天聰」；<sup>73</sup>「路端便娟子，但恐日月傾」；<sup>74</sup>「陰陽有舛錯，日月不當融」；<sup>75</sup>「灼灼西隕日，餘光照我衣」。<sup>76</sup>其中「日月不當融」亦化用《左傳》文字，昭公五年記叔孫穆子初生，其父莊叔為其卜得〈明夷〉卦，卜楚丘解釋「明夷」的意思是「明而未融」。<sup>77</sup>至於「灼灼西隕日」之比附魏室就更為讀者肯定，張銑《文選》注曰：「頽日喻魏也」；<sup>78</sup>杜甫〈成都府〉云：「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南宋蔡夢弼(??)箋引「阮嗣宗〈詠懷詩〉『灼灼西頽日，餘光照我衣』」曰：「日薄桑榆而其光翳翳，止足照我衣裳而不能遠照，喻明皇以太上皇居西內也。」<sup>79</sup>其他何焯、方東樹及清陳祚明(??)等，闡解皆同。<sup>80</sup>

<sup>72</sup> 《曹子建詩注三種／阮步兵詠懷詩注》，頁 346。

<sup>73</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 10·阮籍·四言詠懷詩十三首之八》，頁 495。

<sup>74</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 10·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之七十五》，頁 509。黃節認為「便娟子，阮以自況。」(《曹子建詩注三種／阮步兵詠懷詩注》，頁 429)則「恐日月傾」除了表示時間流逝，也寓其憂魏室傾頽之意。

<sup>75</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 10·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之四十二》，頁 504。

<sup>76</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 10·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之八》，頁 497。

<sup>77</sup> 《左傳》昭公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 ䷣ 之謙 ䷎……」卜楚丘曰：「……明夷，日也……明而未融……。」

<sup>78</sup>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 23·詠懷·阮籍詠懷詩十七首之十四》，臺北：華正書局影宋本，1980 年，初版，頁 421。

<sup>79</sup> 唐·杜甫撰，宋·魯訔編次，宋·蔡夢弼會箋：《杜工部草堂詩箋·卷 18》(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年，初版)，頁 6。

## (二) 借事典爲題而發揮

余光中(1928-)曾談及他創作時使用「徵引」修辭的用意：「我以古人古事入詩，向來有一個原則，就是『古今對照』或古今互證，求其立體。」<sup>81</sup>這是創作者對自己「擬古用事」書寫策略的自白。前述讀者對阮籍詩的闡解，多由時事比附徵經之處，正是出於「古今互證」的觀點，為可能普泛的詠懷，尋求立體的事證、譏議，從而見其人之志。又如〈詠懷〉第十一首「湛湛長江水」<sup>82</sup>及第三十一首「駕言發魏都」，<sup>83</sup>前人也指出此詩並非純詠史，而是有借古諷今之旨。

除了古今對照，余光中也提及他在創作中徵引古人古事有時是為了「異其觀點」<sup>84</sup>，借古以開新。阮籍之徵引經傳文字亦如是，除了前一節的徵詞寓意，也可找到運用事典以開議論的書寫策略，有的甚至僅止於借題，開展的完全是創作者對當代社會的感觸，以及內心再也無法沈抑靜默的激動。<sup>85</sup>因此，若果阮籍真有意「假事諷時」，則其書寫策略可說是對孔子「微言大義」表述法以及《春秋》屬辭比事之教的直接繼承，因此方東樹以「春秋筆法」、<sup>86</sup>朱嘉徵以「《春秋》志畏而言謹，（阮籍）可謂兼之矣」<sup>87</sup>稱美之。以文學效果而言，文學是揉捏過的話語，而這種創造性、個別性及其與現實若即若離的迷離惆恍，往往是文學吸引讀者的要素之一。

<sup>80</sup> 《義門讀書記·文選·卷2·詩》：「西日喻魏室也」，頁14。《昭昧詹言·卷3》：「言將亡不久，以比爽也……亦疑辭爽辟之時作。」頁85-86。《采菽堂古詩選·魏4·卷8》：「西日之隕，言魏將亡而於恩不泯也。」，頁240。

<sup>81</sup> 余光中：《〈敲打樂〉新版自序》，《余光中詩歌選集》，第3輯（時代文藝出版社，1997年，初版），頁70。

<sup>82</sup> 李家樹，陳桐生：《經學與中國古代文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4年，初版）也提到：「阮籍用來比興的事物，除了自然景物之外，有時還藉助於典故來表情達意。如第十一首是借詠史來諷刺時事……。」頁38。《昭昧詹言·卷3》：「此借處王之荒淫無道將亡，以比今日之曹爽不知司馬氏之同於穰侯，將以爾調酸鹹也……借楚事為證……通身用比，而意在言外。」頁86。《義門讀書記·文選·卷2·詩》亦云：「此篇以襄王比明帝，以蔡靈侯比曹爽，嗣宗爽之故吏，痛府主見滅，王室將移也。」頁14。

<sup>83</sup> 《詩比興箋·卷2》：「借古以寓今也。」頁41。《昭昧詹言·卷3》曰：「借梁王以陳殷鑑……言為言魏將亡於司馬氏耳。」頁90。《采菽堂古詩選·魏4·卷8》也認為此詩：「借弔古以憂時。」頁246。

<sup>84</sup> 余光中：《〈敲打樂〉新版自序》，頁70。

<sup>85</sup> 《詩比興箋·卷2 阮籍詩箋》云：「其詩憤懷禪代，憑弔今古。蓋仁人志士之發憤焉，豈直憂生之嗟而已哉。」，頁40。

<sup>86</sup> 《昭昧詹言·卷3》，釋「徘徊蓬池上」一首，頁87。

<sup>87</sup> 《曹子建詩注三種／阮步兵詠懷詩注》，頁380。

當然，既曰「借題發揮」，則全篇旨意與片段所見之徵引未必相同，如阮籍〈詠懷詩〉第四十二首，以回環譏諷的書寫模式，先由「王業須良輔，建功俟英雄」發端，並舉舜任賢人為典範，但全詩歸結的旨趣其實在「保身」，而非建功樹名：

王業須良輔，建功俟英雄。元凱康哉美，多士頌聲隆。陰陽有舛錯，日月不當融。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沖。園綺遯南嶽，伯陽隱西戎。保身念道真，寵耀焉足崇。人誰不善始，鮮能克厥終。休哉上世士，萬載垂清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10·阮籍·詠懷詩82首之42》，頁504）

阮籍以舜舉八元八凱作為良才及英雄協助君王建功立業的典範，以儒家的君臣遇合共建王業發端，中段感嘆人世之風雲詭變，從而轉入「保身」的主旨。阮籍此詩以儒經思想及文句包裹道家思想，「元凱」、「頌聲」、「日月不當融」、「人誰不善始，鮮能克厥終」分見《左傳》及《公羊》，<sup>88</sup>而詩之主旨乃竟轉而崇隱遯以「保身」，詩中徵引「人誰不善始，鮮能克厥終」，已無《左傳》原典裏敦勸改過的意思，而是「異其觀點」將「八元八凱」等功業之思轉成「明哲保身乃能克終」的概念。全詩看似又是一首離經而歸老莊的宣示，但細品其篇章架構，始於「王業」終於「不朽」（萬載垂清風），骨架依然是三不朽；論述邏輯則先強調「建功」這個現實價值，但若現實條件不足——「陰陽舛錯，明而未融，天時為否，人事多沖」，世亂讒勝時，自當先求「獨善其身」，也許將來還有機會「克終」。「克終」在阮籍此詩中是有歧義的，可以是如伯陽等人「保身以終」，但也可以是明夷處味，伺時以終其王業建功等志，因為「休哉上世士」指的是伯陽等隱遯之士，也可以上括建功立業的英雄良輔。

〈詠懷〉第七十五首也有類似的出處矛盾：

<sup>88</sup> 舜舉「八元八愷」事見《左傳》文公十八年；「頌聲」見《公羊》宣公十五年：「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日月不當融」則暗指時局之明夷，典出《左傳》昭公五年：「卜楚丘曰：『……明夷，日也……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於人為言，敗言為讒……世亂讒勝，勝將適離。』」；「人誰不善始，鮮能克厥終」原出《詩·大雅·蕩之什·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但《左傳》於宣公二年及襄公三十一年兩度引用。且宣公二年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阮籍引此典的句法，明顯來自左傳》。

梁東有芳草，一朝再三榮。色容豔姿美，光華耀傾城。豈為明哲士，妖蠱諂媚生。輕薄在一時，安知百世名。路端便媚子，但恐日月傾。焉見冥靈木，悠悠竟無形。（《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 10·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之七十五》，頁 509）

前賢認為此詩乃疾王祥「不能忠魏而委屈於時」。<sup>89</sup>姑不論其實指為誰，詩中斥責輕薄之人「安知百世名」，確實有《左傳》「立名不朽」的價值觀；文末卻又以悠悠無形的「冥靈木」推崇莊子逍遙的思維。這樣的內在衝突，其實道盡士人處亂世的無奈。當然，「出或處」本非「儒與道」之分，儒家本身也多次談到出處原則，「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sup>90</sup>但阮籍以「冥靈木」對稱於「百世名」，除了有大年小年的時間對比，也很難不令讀者聯想到他是有意藉兩詞出處而以儒、道兩種價值比較的。由原典夾帶而來的意義「月暈」，<sup>91</sup>並非作者能完全避開的閱讀效應。

乍看這些詩文，阮籍在出處的抉擇上，是拿捏不定的。但由其徵引經傳文字所延伸的寓意，仍可見出不論其人最終是否選擇道家哲學作為生命依歸，積澱在意識裏的儒學背景是難以磨洗的，其浮現於文字的，只如冰山之一角。因此，儒道兩種價值的依違與拉扯，就常常成了此期文學的主旋律。清陳祚明評阮籍〈詠懷〉呈現的轆轤曰：

情見乎辭，在誠難飾。今既脫略榮華，好談輕舉，乃復縈懷親愛，甚戀綢繆，非徒旨謬老莊，亦恐卜迷詹尹。<sup>92</sup>

陳祚明認為〈詠懷〉詩表面雖有「脫略榮華」之思，又好談避世，但對家國君主猶抱「縈懷親愛」，其愛戀之綢繆難解，甚至已「情見乎辭」，此與老莊之旨相違。

<sup>89</sup> 《曹子建詩注三種／阮步兵詠懷詩注》，頁 429。

<sup>90</sup> 分見《論語·公冶長》，頁 41；《論語·衛靈公》，頁 138。

<sup>91</sup> 此處「月暈」單純比喻見月亦見月旁散發之光暈；但義略有借用「月暈效應」理論：「被觀察的當事人在觀察系列之前做了某些事情——或許，迅速解決一個問題，或發表一些有見識的評論——使得觀察人員受到影響。這造成的結果是一種月暈效應(halo effect)。」(特魯爾(Timothy J. Trull)著，游恆山譯：《臨床心理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7年，初版，頁 333)。

<sup>92</sup> 《采菽堂古詩選·魏 4·卷 8》，頁 240。

由阮籍作品中對《春秋》經傳字詞事例的細密徵引，以及諸家對阮籍詩作的闡解，可見歷來評家在「解密」之前之後，皆認定架構阮籍其人意識核心的文化底蘊，依然是儒家；但在求生存的生命本能與高尚志節的精神之間，似乎道家是一條可以走得通的路。只是，即便欲思改轍，亦因放不下心底深處儒學價值的糾纏，因而一如「去故鄉而就遠」的屈原，因軫懷故國而頻頻回首，從而不免「心嬋媛而傷懷」。

### 三、由〈詠懷詩〉《春秋》典故的闡解看經典之傳播

清章學誠(1738-1801)曾言：「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sup>93</sup>更何況文學是矯揉過的話語，「不像日常用語那樣時刻粘住指稱物件，文學話語可以撇下現實自行其是地舞蹈。這意味著文學話語沒有必然的義務介入現實。」<sup>94</sup>然而，讀者閱讀理解的活動，除了與作者神交，更在「以意逆志」的過程中，有與作者鬥智較勁的意味，對意義的掌握產生解構再建構的閱讀效應。闡釋究竟能還原作者多少真意，實在是難以追根究底的大議題；「〈詠懷〉之作，其歸在於魏晉易代之事，而其詞旨亦復難以直尋，若篇篇附會，又失之也。」<sup>95</sup>況且，闡釋活動究竟是為了追尋作者真意或二度書寫讀者胸臆，都是值得探討的議題，但最主要的是，透過對經傳文字徵引之層層剝繭（文化語境），「學者苦心探索，可知作者根柢之淺深」，<sup>96</sup>再與新文本時事（情景語境）聯結，「必處阮公之遇，據阮公之志與事，乃見其沈痛傷心。」<sup>97</sup>這樣的閱讀與闡釋過程，的確既符孟子「知人論世」，又能深入符號表意特質的閱讀進路。

但是如果這一切比附時事的闡解是讀者的「單相思」呢？比如〈詠懷〉八十二首中的第一首：

<sup>93</sup>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編4·言公》（臺北：華世書局，1980年，初版），頁112。

<sup>94</sup> 南帆：《文學的維度》（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初版），頁29。

<sup>95</sup> 《義門讀書記·文選·卷2·詩》，頁12。

<sup>96</sup> 清·高宗御製，清·方苞奉敕編：〈評點歸有光〈大學之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欽定四書文》第1451冊，頁75。

<sup>97</sup> 《昭昧詹言·卷3》，頁81。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讀者可以確定的只是全詩瀰漫一股憂思孤獨氣氛，但若要追究阮籍究竟所憂何事，是無法在文字字面找到事證的。但日人吉川幸次郎卻由「外野」這個看來極為普通的字眼找到「蛛絲馬跡」，由於這段話能充分顯示讀者閱讀時因文本徵引字詞而引起的閱讀效應，故長錄如下：

第三聯的「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就具有更為明顯的象徵之意了。「孤鴻號外野」句中的「外野」一詞，或許是用《左傳》中的典故。《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當時有一首預言魯昭公將亡命野外的童謠云：「鸛鵒之羽，公在外野。」不過，即使詩人在這句詩中並未有意用典，卻也正如許多注家所解釋的那樣，能夠看出句中所描寫的景象乃為社會現實之比喻。其時，司馬氏陰謀篡位，肆意廢棄、殺戮魏王朝的幼弱天子。而這句詩即比喻魏室那些不幸幼主的遭遇。下句中的「翔鳥」，《文選》一本作「朔鳥」，但無論是作什麼，都是比喻篡奪魏帝之位的司馬氏一黨。<sup>98</sup>

這段話一可見到使用典故可達到「文外有意」的效果，尤其是徵引《春秋》經傳，總令讀者更容易往「微而顯」、「志而晦」的書寫模式去揣測文意；二是詩歌一旦完成，讀者閱讀而建構的意義，常已凌駕作者的原意——如吉川幸次郎所稱「即使詩人在這句詩中並未有意用典，卻也正如許多注家所解釋的那樣，能夠看出句中所描寫的景象乃為社會現實之比喻。」

漢末以來士人以《春秋》稱《左傳》的情形漸多，顯現時人肯定《左傳》的解經功能，如杜預自稱有「《左傳》癖」，但實兼研《春秋》經。<sup>99</sup>阮籍〈詠懷詩〉顯引《春秋》三傳的比例並不高，大約只有十分之一，但若據此論定經學衰微卻又嫌於草率，蓋阮詩於吞吞吐吐之際，其徵引《春秋》三傳者，並未因隱而不顯、寡而不彰，而被忽略，反而更受到後代讀者注意。甚至對阮詩之闡解，皆由此入手「定其譏刺」之深意。此種闡釋心態明顯受到「屬辭比事，《春秋》教」觀念的

<sup>98</sup> 日·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02。

<sup>99</sup> 《新校本晉書·卷34·列傳·杜預》，頁3147。

影響，以及所謂《春秋》褒貶意識的作祟，讀者總不斷想透過阮籍詩句裡的蛛絲馬跡，拼湊其內心「可能存有」的對時事的譏刺。

此外，〈詠懷詩〉所引三傳分量失衡，幾乎全出自《左傳》。當然這之中各種原因都有可能，比如阮籍涉獵典籍的個人偏好，或《左傳》文本的敘事性較其他兩傳高、適合徵引以為典故……等，但由《春秋》三傳傳播的角度來看此現象，「阮籍〈詠懷詩〉」這個載體所傳播的《春秋》三傳幾乎只是《左傳》，此現象多少可作為學術史三傳消長論述旁證之一。

#### 四、結論

以學術流變的角度來看文學風尚，魏晉之交的正始時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作為此期代表作家的阮籍於〈詠懷〉詩中卻不乏徵引經典，甚至亦有以立功、不朽等儒家價值為志的詩句，放在正始玄音中，很容易引起讀者猜疑其中必有深意。可見其創作中的徵經，不論量之多寡，引起的闡解效應就是比一般的比興修辭還大。當然阮籍是否有意透過〈詠懷〉影射時事，乃至譏諷特定人物，或許已是難以考索的論題，但闡解所能作的，本就只是透過留存在詩句文字中的「跡」，揣想其所詠之情懷脈絡、蠡測其歸趣。本文則由歷代對阮籍〈詠懷〉詩的闡解，追蹤《春秋》經傳的闡解流變與傳播。阮籍引用《左傳》典故時，究竟側重《左傳》之史料價值？或發揮經義？或文辭之美？若由「如何再現《春秋》經傳典故」來看〈詠懷〉詩所再現的《春秋》經義，讀者攫取到的大義是什麼？〈詠懷〉詩之所以撲朔迷離，正因其人不欲顯豁其旨，故本研究追躡的，不是阮籍的意旨是什麼，而是後人如何闡解這個區塊，此本文所謂之「闡解效應」，而此效應正可見《春秋》經傳相關的「大義」意識如何影響文學文本的闡解；反過來說，亦可見文學文本（不論有意或無意）是如何成為經義傳播的載體。

由阮籍作品中對《春秋》經傳字詞事例的細密徵引，以及諸家對阮籍詩作的闡解，可看到讀者認定阮籍詩中的《春秋》經傳字詞典故像是某種「密語」，讀者的闡解就是透過原典的經義與阮籍的現實環境來交叉「解密」，讀者帶著「其詩必有『春秋褒貶』」的意識來解釋其人的儒家文化底蘊，再以「求生存與高尚志節的道家展演」來平衡其詩旨所呈現的出處矛盾。

統觀前述諸家對〈詠懷詩〉所用典故的闡釋，如「嘉樹」有「召公輔政」之

思；「鶉火中」更被認定有「君子道消」之惆悵；「舉袂當朝陽」聯結「諸侯用命」之尊王思想；「王業」與「百世名」有立功立名不朽觀，皆側重經訓；唯有以「白日」喻君王，較接近文學譬喻用法；「八元八凱」則側重舉史為證。由此可見，阮籍用典之初心雖未可確知，但歷來闡解的「傾經」進路極為明顯，尤其出處若能有二者，如「憔悴」亦可能引自《莊子》，甚至以阮籍崇放達的行事風格來看，此詞更可能來自《莊子》之影響；或阮籍單以普通詞彙用之，初無典故之思，但讀者於此詞的闡解概用《左傳》「憔悴」之文化語境，亦即延伸為「備不可已」之義；又如認定「舉袂當朝陽」一句是化用《左傳》「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從而闡解此詩乃記阮籍不應曹爽之召；又如認定「鶉火中」是阮籍藉春秋卜偃事來古今互文暗指司馬廢立之事。凡此皆可看出引用經傳成詞的意義擴散效應，以及讀者闡解詩旨時被《左傳》原典影響的闡解效應，此何以本研究稱文學文本亦經學傳播之重要載體也。

透過歷代讀者的解構與再建構，吾人可以了解，阮籍在詩文辭賦中，屢屢透過引用《左傳》文句或人事，表達仰慕事功之思、肯定三不朽可補生命之侷促等思維；尤其〈詠懷〉中的徵經修辭，其實是在前行坎懣，卻行不甘的心境下，透過對經典的叩問，譴責俗世價值崩亂，抒發內心的憂恚；總之，指的是桑，罵的是槐；另一方面，作者又可藉此演展出入自得的不羣之姿，以此聊慰憂思百結。因此，讀者由其創作中對《左傳》的徵引且融入現實事件之論述，敷陳阮籍「不棄經典」的形象，認定他從未「迴避現實」，也不是「不用詩敘事，也不用詩歌言志」，而是藉由經傳隱約其敘事、淵微其情志。

不論言之者有意無意，聞之者的感受是「此中有真意」——徵經之中蘊含作者吞吞吐吐欲言未能的真意。在讀者往復討論，細咀辨析之中，《春秋》經傳的原典以及微言大義的表述法，皆獲得一遍又一遍的銘刻。當經學家堅持「守經遵註，不敢或失」；入仕的儒士不斷強調「通經致用，以定邦國」之際，文學創作卻是通過傳寫改鑄等手法，以文學之美不斷將經傳拉到具體生命現場，將渺遠的古訓，與具體的歷史事件、徬徨的靈魂扣合，從而拉動讀者心中的弦，一代一代傳響下去。在這一意義上，阮籍創作時對《春秋》經傳的徵引，成為經傳闡釋不可抹煞的一環。



## 徵引文獻

### 一、古籍（以朝代為先後）

東周·管仲著，王冬珍，徐文助，陳郁夫，陳麗桂校注：《管子》，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年，初版。

東漢·班固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8版。

晉·陳壽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8版。

南朝宋·范曄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8版。

南朝宋·劉義慶編撰，楊勇著：《世說新語校箋》，香港：大眾書局，1969年，初版。

南朝梁·蕭統編撰，唐·李善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影宋本，1980年，初版。

南朝梁·劉勰著，陳拱本義：《文心雕龍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初版。

南朝梁·鍾嶸著，陳廷傑注：《詩品注》，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初版。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初版。

唐·杜甫撰，宋·魯豈編次，宋·蔡夢弼會箋：《杜工部草堂詩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

唐·李延壽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

唐·李延壽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北史》，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

唐·房玄齡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宋·佚名：《歷代名賢確論》，收入清·紀昀等奉敕編纂：《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影印。

宋·李杞：《用易詳解》，收入清·紀昀等奉敕編纂：《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影印。

宋·蘇軾：《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收入（宋）左圭輯：《百川學海·壬集》，（日）京都：

中文出版社，1979年影本。

宋·嚴羽著，清·胡鑑注，任世熙校：《滄浪詩話校注》，臺北：廣文書局影清刻本，1972年。

明·方孝孺：《遜志齋集》，臺北：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印，1970年。

明·許學夷：《詩源辯體》，明崇禎15年陳所學刻本。

明·焦竑：《焦氏筆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公司，2004年。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日）京都：中文出版社影清刻本，1982年。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卷上》，臺北：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印，1970年。

清·陳沆：《詩比興箋》，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清·陳祚明選輯，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華世書局，1980年。

清·顧炎武著，徐文珊點校：《日知錄》，臺北：臺灣明倫書局，1979年。

清·高宗御製，清·方苞奉敕編：〈評點歸有光〈大學之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欽定四書文》第145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二、近人論著（以姓氏筆畫為先後）

王夢鷗：《傳統文學論衡》，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

呂正惠，蔡英俊：《中國文學批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

呂光華：〈論阮籍四言詠懷詩的內容與特質〉，《國文學誌》第9期（2004年12月），頁75-92。

李紅巖：《魏晉南北朝困厄文人創作研究》，陝西師範大學中古代文學2011博士論文。

李家樹，陳桐生：《經學與中國古代文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4年。

岑紹基：《語言功能與中文教學：系統功能語言學在中文教學上的應用》，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3年，初版。

余光中：《余光中詩歌選集》第3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7年。

南帆：《文學的維度》，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

高晨陽：《阮籍評傳》，收入匡亞明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第34冊，南京：

-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 徐啟秀：《阮籍〈詠懷詩〉研究》，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 2010 碩士論文。
- 唐翼明：《魏晉文學與玄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
- 陳久金：《中國星座神話（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二十））》，臺北：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曹勝高：《從漢風到唐音：中古文學演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 張燕燕，鄭亞南：〈概念隱喻理論與類包涵理論的比較研究〉，《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2 卷第 4 期（2010 年 12 月），頁 82-92。
- 莊萬壽：《嵇康研究及年譜》，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
- 遂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黃節：《曹子建詩注三種／阮步兵詠懷詩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葉嘉瑩：《葉嘉瑩說阮籍詠懷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初版。
- 楊儒賓，黃俊傑編：《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
- 魯迅：《魯迅作品全集·而已集》，臺北：風雲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
-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文化史》，臺北：知書房出版集團，1995年。
- 劉運好：《魏晉哲學與詩學》，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
- 錢志熙〈論阮籍〈詠懷詩〉〉，《東方叢刊》，2008年第1期（2008年），頁 105-127。
- 韓傳達：《阮籍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 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
- 日·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